

无锡革命史料选辑

第六辑

中共无锡市、县委党史办公室 编
无 锡 市 档 案 局

无锡革命史料选辑

第 六 辑

· 内 部 发 行 ·

中共无锡市、县委党史办公室
无 锡 市 档 案 局 编

封面设计 陶士范
本辑编辑 徐惠德
杜 松

无 锡 革 命 史 料 选 辑

第 六 辑

无 锡 市 太 湖 印 刷 厂 印 刷

开本 850 × 1168 毫 米

字数 100,000 印数 10,000

1986年3月印 工本费0.7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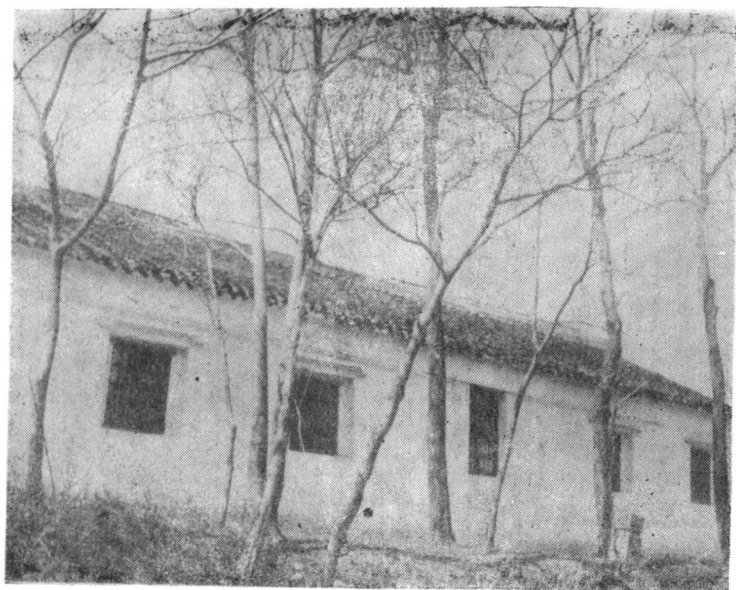
• 内部发行 •



高文华烈士



储新民烈士



六祭祠旧址



嵩山寺旧址

无 锡 革 命 史 料 选 辑

第六辑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

目 录

·回忆录·

- 在无锡被捕入狱……………管文蔚 (1)
- 回忆解放前无锡的几个进步团体……………孙翔凤 (16)
- 无锡地区抗日战争回忆……………翁迪民 (28)
- 回忆在澄西和东路特委工作的一些情况……………凌 菲 (32)
- 苏浙交通运输线的回忆……………吴明义 方国风 (40)
- 开辟无锡西北地区……………杜平波 (54)
- 发刊民歌稿为新华社通讯稿所载引……………钱小柏 (60)

·诗与歌·

- 江舟诗选(二十二首)…………… (64)
- 难女曲…………… (93)
- 爱护江抗军…………… (110)

·专题调查·

- 五四运动在无锡……………朱昱鹏 陈宽良 (75)
- 一二九运动在无锡……………秦建君 (89)
- 我党政军北撤 国民党卷土重来……………荣宝甫 李广平 (94)

·革命斗争故事·

- 刘群先算命.....王 鹰 (104)
智擒上任官.....李 觉 (107)

·烈士传略·

- 高文华烈士事略.....王 纫 (111)
高文华给妹妹的信..... (122)
怀念哥哥高文华烈士.....高福珍 (124)
储新民烈士传略.....荣宝甫 李广平 (129)
怀念好战友储新民烈士.....朱 帆 (135)

·革命遗址介绍·

- 六祭祠.....朱昱鹏 (138)
嵩山寺.....许海泉 (140)

·小资料·

新四军人物介绍

- 何克希简历..... (39)
张 英简历..... (53)
刘 飞简历..... (106)
任天石简历..... (128)
乔信明简历..... (134)
征稿启示..... (59)
《无锡革命史料选辑》1—6辑要目..... (142)

在无 锡 被 捕 入 狱

管 文 蔚

我的住地移到通惠路达鑫(耀记)翻砂厂,名为“厂”,实际上是个小翻砂铺。倪阿来既是厂主,又是工人,另外雇了个小徒弟做做下手,以维持生活。

这翻砂厂,楼下一大间为翻砂间,楼上一间一隔为两小间。大一点的那间,倪阿来夫妇住;我住在小房间内;小徒弟住在翻砂间里。

达鑫翻砂厂出门,穿过顺兴里,就是广勤区第一台戏馆。

情况很紧张,白色恐怖很厉害。天天有人被捕或被杀。一方面由于我党领导的江西及各地武装斗争节节胜利。几个月来红四军入闽,先后占领长汀、上杭、连城、永定、龙岩、武平、宁洋、漳平等地,闽西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。同时在江西又攻占了南丰、会昌等九县,推动了赣南各地的起义。邓小平、张云逸、李明瑞、韦拔群等,在广西领导了百色起义,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,以及红七军、红八军。湖北洪湖地区,段德昌、段玉林领导的两支游击队会合,组成了红六军,部队发展到四、五千人。许继慎、曹大骏、徐向前等在大别山成立了红一军。我党领导的武装斗争迅速发展,使敌人大为震恐。另一方面,由于我们大喊大叫要搞五一总同盟罢工和各地武装暴动,引起了敌人的警觉。于是

就严加防范和镇压。那几天，公共场所各处，便衣密探进进出出，象狗一样，东嗅嗅，西闻闻，发觉一点蛛丝马迹，就大肆出动，戒严、搜查、逮人。茶馆里贴着“请客人莫谈国事”的大纸条。你只要一议论国事，发几句牢骚，就立即有惹祸的危险。老百姓也感到人人自危，恐慌得很。

敌人已掌握到我们活动的规律：每逢五一、五四等大的节日，我们都要搞大的行动，而活动的时间一般总是在上工、放学或晚上，地点又大多在工厂区域或公共场所。我们也明知敌人已掌握我们的活动规律，哪些时间已不利于我们活动，我们应该如何去躲避，但还是要去搞，以“赤色恐怖对付白色恐怖”，到处贴标语，散发传单，恐吓敌人，结果总是相反。想想真是幼稚得很，革命经验的取得实在不易。

为了更好地组织五一大罢工，同时又避免敌人注意，行动委员会决定对各工厂进行单线领导，防止面的接触。由我联系庆丰、裕昌等，周荣根联系申新，倪阿来联系广勤。我觉得住在倪家，来往人太多，那地段靠近戏院，情况很复杂，天天想设法离开，但又找不到房子，总似有块石头压在心上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和倪阿来两人商量了大半夜。

我说：“形势很不好，我随时都有被捕的可能。我们应事先把供词对对好。万一我或者你一旦被捕了，我们在几个关键问题上要统一口径，免得临时出毛病。主要是我们两人的关系，一定要咬紧，坚持说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，我是来无锡找职业的，你是租房子给我住的，我的女人已经回金坛去，千万不能说别的。我的几个化名：夏继尘、顾雅思等都被敌人掌握，列入了通缉的名单。敌人一找到我，就有可能被处决。你千万不要提这些名字。

如果敌人提到，你无论如何要坚持说不认识，或不知道。你老婆是文盲，说什么让她瞎说去，只要我们两人口供一致就行。我今后改名为管兰亭，金坛人，这是我小时候在金坛用过的名字，一般人不知道，到金坛我家去可以查到根的。这就不怕敌人查了。关于党组织的事，千万不能透露一点！根据最近一连串事情来看，你只要一供党的秘密，肯定马上会被枪毙。一供，就杀。不供，又无证据，问题不大。这是不能存有任何侥幸的！党的机密比生命更重要啊！”

应变的口径就这样统一了。

当时，有许多问题必须作过细考虑，因为严峻的现实不容许我有丝毫疏忽。许多不可弥补的损失，往往是由于一些看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引起的。

倪阿来的妻子是不可靠的。但是倪阿来是一个好同志，勇敢顽强，讲义气，万一被捕，他不大可能会出问题，但他的老婆是有外遇的，很危险。她不是我们的同志，我们没法将实际情况以及万一出事如何应付敌人等办法对她讲，只好随她去了。

五一总同盟罢工的日子渐趋临近。无锡的配合工作必须抓紧，即使只有一两个大厂能罢起工来也是好的。我把目标集中到庆丰、申新这两个有几千工人的大纱厂上，争取一个首先罢起工来，然后影响其它厂。周荣根原是丽新纱厂的铜匠，病在家里。我与他谈了之后，他带病去工厂活动。我联系庆丰厂，自己不好出面去开会，只好由一位姓王的支部书记负责，组织女工中的党员在她们家里开会。这些党员大多是细纱车间的女工，活动能力较弱。行委要她们抓住取消搜身这一群众迫切要求，进行串连，以帮助姐妹的办法，大力开展工作。但工人顾虑很多，一时发动不

起来。

申新厂的工人待遇比较好，工资以外，厂方每天还免费供应一餐午饭，三菜一汤。周荣根找厂里几个同志研究五一罢工问题，他们一致不同意这样搞法，说：“一罢工，我们就暴露了。现在条件还不成熟，只能等一等，待有机会时再提出来。”

周荣根向我汇报。我想：“勉强搞也不行，就只好让步。”我问周荣根：“不罢工，是不是可以贴些标语，散些传单呢？”

他表示不能这样做，一做就会使组织被破坏的。

飞行集会的做法，厂内已根本不能搞，厂外人也不便去，因这几天各大厂都有二十多名厂警，加紧在厂内外巡逻。特别是在放工的時刻，还有便衣侦探分布在厂的附近。你一喊口号，他们就从你身后将你抓起来！考虑再三，只有在散工时，带一些传单悄悄地撒在地下，工人群众象潮水般地涌出来，不易被发觉。这样效果差些。这种蠢事，我们做了几次，相反地把厂里搞得特别紧张起来，少数觉悟较低的工人反过来骂我们，说是害他们。

以后我们向省委写的工作汇报中说：“统治阶级被我们吓慌了。”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。教训是上面任务压得紧，下面不得不说假话。

我对各县工作都作了部署。

四月八日回到达鑫翻砂厂，刚吃晚饭，突然几十人把我们住的房子团团包围了。“嘭”的一声，门被踢开。几个彪形大汉冲上楼来：“把手举起来！”

我一看，三支手枪对着我。我放下饭碗，站起来，沉住气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“少噜嗦！”一个化装成工人模样的便衣进来就将我上了手

铐。

敌人搜查了我的住屋，什么也没有搜到。

他们又抄了倪阿来的房间。房间角落头的墙缝里，塞着几张要求增加工资的传单，很不容易发现，他们一进去就拿到了。这明显是有内线的。

敌人把我和倪阿来铐在一起，倪鲍氏没有上手铐，一并带走。

临走时，我对他们说：“那小皮箱我不要了，那件夹长衫我带着。”

他们将长衫从上到下摸了摸，扔给我。

一路上，我趁他们不在意，悄悄对倪阿来说：“那晚上说的事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”

“一定要咬紧牙关！”

“嗯。”他点了下头。

到了警察局。当晚就开审，他们紧紧追问共产党的事情。

“你是共产党！把你的同党交出来！”

“我不是共产党，哪里有什么同党！”

我一被捕，就作了牺牲的思想准备，要我承认是共产党是不行的。我身上有那么多多的关系，从镇江、丹阳、常州、无锡、苏州，直到上海，这么多同志与组织，我一出纰漏怎么得了！宁死，不承认是共产党人。

敌人就用酷刑：踩杠子、吊打、火油灌鼻子。

我被整死过去三次，冷水一泼，又醒过来。歇个把钟头，再审，再动刑。

我说：“你们一定要我说，我就说，钱逊卿(商会会长)、荣德生(大资本家)和县党部的一批负责人都是我的同党！”

敌人恼羞成怒，再用刑。我还是那几句话。搞到半夜，没有结果，把我关进一间屋子，地下铺着薄薄的稻草，我就在稻草上躺下过夜。

倪阿来受审的地方，与我隔着一间屋子，但是房间不大，又是板壁，声音听得很清楚，想是故意审给我听的。

用刑时，倪阿来伪装叽叽哇哇地惨叫。

他老婆鲍氏又哭又劝：“你说嘛，那几张传单都是姓管的给你的，他是共产党，讲了，你就没事了！”倪阿来骂了他老婆。

倪阿来只说不知道，并死死咬住说他不是共产党。

“管兰亭跟你什么关系？”

“他是金坛人，来找事做的，租了我家的房子。其他的事情，我不知道。”

审来审去，还是这几句话。

第二天，白天让我睡觉，我昏昏沉沉的，似睡非睡。刑伤很痛，浑身不能动弹。估计夜里还得刑讯，必须咬紧牙关挺住，不供还是会有希望的。

晚上，我又被整死过去几次，浑身不能动了。我想，他们不敢将我就此弄死的，挨着吧，躺着吧，不说话，看他们对我有什么办法！

第三天晚上，敌人又逼供。我神志模糊地说：“你们局长、县长、书记长都是共产党员……钱逊卿、荣德生都是共产党员……”

敌人没办法，看我这样已经不起敲打，不敢再用刑。加之，

我在最后一次受刑时，透露我是金坛大地主某人的孙子，某人与金坛马荫棠老先生是好友，请他们去查查，看是不是共产党？我早知道县里侦缉队的头目沙壳子是帮会头子，系金坛马荫棠的徒弟，因此这样说的。敌人一听我与马荫棠有关系，心里慌了。马是他们的“老太爷”呀！只好把我暂时搁下了。

接着，金坛马荫棠给沙壳子打来长途电话，关照他要照顾好管某。这样事情就松下来了。

为什么马会这样快从金坛打电话来呢？当我被解到警察局，关在一间屋子里候审时，乘隙把一件好长衫送给看守我的警察，请他从速给我家里发封快信。信寄出后，我再给他二十块钱作为酬谢。那警察高兴极了。他每月只有八块钱薪饷，有这么多外快，怎么不快活？下岗就按我讲的意思发了快信。我父亲接信后，连夜赶到金坛，请马荫棠打电话关照，请他大吃大喝并送礼。同时，又叫我堂兄赶来无锡，给沙壳子送了重礼，请他设法不要解送南京，而送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，并请了无锡的大律师张桐代我奔走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规定，凡是共产党县以上负责人，要送南京宪兵司令部，一般共产党员和嫌疑分子，则送司法机关。

我这件长衫起了很大作用。

张桐律师受我家里委托，找到警察局的头子，说：“你把管兰事关了几天了，秘密刑讯，国法规定抓了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送交司法机关，你们已经大大超过这期限了！怎么交代？”

警察局长见律师出面干预，就赶紧把我和倪阿来转送县初级法院。

在离开警察局时，沙壳子来看望我。他摸摸我的头，说：“你年纪这么轻，家境又这么好，何苦要干这些事呢？你叫人家

罢工，人家砸了饭碗，日子怎么过呀！”

“谁说我叫人家罢工，还不是他们栽害我的。”

“传单都搜出来了，还能赖吗？”

“什么传单？那是栽赃害人！”

他默不作声地走开了。

过了一天，承审庭开庭。我看到上海C.Y.派来的华希贤，还有徐荣生两人也在那里候审。他们住在中正路二十一号机关。我很惊疑，为什么他们也被捕了？华希贤很年轻，不到二十岁，大学一年级学生，政治经验太少。在审讯时，我、倪阿来、徐荣生均否认是共产党员，而华怕又要动刑，说我们是共产党，他自己不是。承审人员问他：“你既不是共产党，怎么知道他们几个是共产党？”他天真得很，说是侦缉队里的人叫他这样说的，不说就要上刑，还要枪毙！

审讯没有结果，敌人就将我们四人关进无锡监狱。看守员为了敲竹杠，把我们四人都钉上脚镣。如果给点钱就可以不钉脚镣。我们都不愿出这个钱。我坐下来，两腿一伸，笑一笑说：“这下可以休息休息了！”

看守没有弄到外快，很生气，说：“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死到临头还开玩笑！”

我那时确实有点轻松之感，就是骨节伤痛和喘咳折磨着我，行动有些困难。

关进无锡监狱后，乘早晨放风的机会，我找倪、华、徐三人秘密谈了谈。我问他们怎么被捕的？有没有证据被搜去？华希贤讲，他是七日晚上，与徐荣生一起被捕的。可能是房东告密，搜出一份当天刚从上海带回的指示（共青团江苏省委第十九号通告）。

这指示要求各地组织罢工、罢课运动，支援南京和记洋行工人的斗争，促成“五一”总示威运动。他刚到家，文件还在皮箱隔层里，被敌人搜到了。刑讯时，他只好承认是共青团员，刚入团不久，情况不清楚。徐荣生说，他未供什么。倪阿来告诉我：他没有讲出他与我的关系。这样，我心里有了底，再次叮嘱他们说：无论到什么地方，不管受什么刑，都不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员，更不能供共产党的组织。否则，个人牺牲事小，党组织被破坏可不得了。我考虑到华希贤是大资本家的儿子，他家里可能劝他投降，因此格外鼓励他说：“我们一定要做一个顽强的共产党员。我们都是党的好儿子，现在到生死关头了，一定要牢记入党时的誓言，在敌人的屠刀面前，绝不能低头！现在只过了第一道关，以后情况不知道。顽强些，更顽强些！只有不怕死，才能闯过难关！”

他们三个人的劲头又鼓起来了。

我们在无锡坐了个把月班房，经过多方活动，于一九三〇年五月被解往苏州江苏省高等法院。等待着我们的，又是一种新的斗争。

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的监狱，在苏州城里司前街内。四周的风火墙有几丈高。监狱分两部分，一部分是十字监，一部分为看守所。看守所又分一所和二所。两部分之间用铁门隔开。

监狱里关的犯人很多。十字监和一、二看守所加在一起，共有两千余人。其中政治犯，有共产党人，也有国民党改组派，大约有八百人左右。年龄小的只有十三岁，老的已经七、八十岁。

我被关在第二看守所的第五十一号号子。这个号子里连我共关了八个人。四个政治犯，是共产嫌疑分子；三个土匪，还有一个小偷。共产党人在监狱里很有威信。

次日放风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主动来找我谈话。

他一见面，就自我介绍说：“我叫冯自由，是监内互济小组的。政治犯来了，我们是有帮助责任的。”

我知道有革命互济会这样一个组织。这个组织的前期为中国济难会，是在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后，由恽代英、董亦湘、沈雁冰等共产党人发起的，其中也有杨杏佛、郑振铎等非党的著名人士。出版过《济难》半月刊。一九二七年“四·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做过大量营救被难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工作。一九二九年下半年开始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成立革命互济会，由潘汉年领导。全国有总会，江苏等省有分会。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血腥镇压，反对逮捕、屠杀革命者，争取释放政治犯，救济被监禁的同志，援助烈士家属等，有时还协助地方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。这组织有一些比较著名的进步人士和大律师参加，实际上是我们党营救自己同志的机构。我没有料到高等法院监狱内也有相应的小组，听他一说真是喜出望外。

我想：这是党派来跟我联系的同志。他的名字怎么与上海先施公司大老板的名字相同呢，大概是个化名吧。

放风时，被关押的人大多在号子里活动，少数人到墙外去倒便桶。

冯自由就跟我在号子里单独谈话。这个人看样子老于生活世故，我不敢贸然太相信他。

他问我的案情。我简单讲了一下，说我是被冤枉抓来的。

他说：“你的案子，只要没供出什么，很快就可以出去的。”

我对冯自由的真实情况，一时还弄不清楚，所以不便暴露自